

生命行旅与

Life Journey and Historical Narrative

世界华文文学研究系列·2014

历史叙述

中国世界华文文学学会 编



暨南大学出版社
JINAN UNIVERSITY PRESS

生命行旅

历史叙述

中国现代文学史论丛刊 第10卷

中国现代文学史论丛刊 第10卷

中国现代文学史论丛刊

世界华文文学研究系列·2014

生命行旅与历史叙述

Life Journey and Historical Narrative

中国世界华文文学学会 编



暨南大学出版社
JINAN UNIVERSITY PRESS

中国·广州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生命行旅与历史叙述/中国世界华文文学学会编. —广州: 暨南大学出版社, 2014. 11

(世界华文文学研究系列)

ISBN 978 - 7 - 5668 - 1267 - 4

I. ①生… II. ①中… III. ①华文文学—文学研究—世界—文集

IV. ①I106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251967 号

生命行旅与历史叙述

编 者: 中国世界华文文学学会

责任编辑: 侯丽庆 王莎莎 曹 军

责任校对: 黄志波

地 址: 中国广州暨南大学

电 话: 总编室 (8620) 85221601

营销部 (8620) 85225284 85228291 85228292 (邮购)

传 真: (8620) 85221583 (办公室) 85223774 (营销部)

邮 编: 510630

网 址: <http://www.jnupress.com> <http://press.jnu.edu.cn>

排 版: 广州市天河星辰文化发展部照排中心

印 刷: 佛山市浩文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mm × 960mm 1/16

印 张: 14.5

字 数: 238 千

版 次: 2014 年 1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4 年 11 月第 1 次

定 价: 38.00 元

(暨大版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总编室联系调换)

编委会名单

主 编 王列耀

副主编 吴奕锜 龙扬志（执行）

编 委 （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列耀	朱双一	刘登翰	刘 俊	李凤亮
杨际岚	杨匡汉	吴奕锜	张福贵	张 炯
陆卓宁	陈思和	饶芃子	黄万华	曹惠民
黎湘萍	潘耀明			

目 录

【理论前沿】

为了世界华文文学的新超越

——在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百年海外华文文学研究”研讨会上的主题发言 饶芃子 /1

论威权统治和主流立场对台湾文学的影响 张诵圣著 刘俊译 /8

“华语语系文学”理论建构的意义和问题 胡德才 /23

何为亚裔美国人

——“亚裔美国文学”之早期族裔批评范式述评 蒲若茜 /32

【海外华人文学研究】

加拿大华人历史的重新书写

——华裔小说中的历史性和文学想象 徐学清 /43

美国华人文学中“故国回望”主题的比较 李亚萍 /56

在文化关系中建构经典的可能性

——以《埃伦诗集》为例 陈涵平 /73

“大”与“小”的辩证：重读郭宝崑的《棺材太大洞太小》 朱崇科 /86

苏曼殊的南洋经验及其文学创作 颜敏 /98

沉溺与抵抗：晚清域外游记中的器物书写 杨汤琛 /110

世界行旅与南洋经验

——马华作家黎紫书访谈 龙扬志 /120

【两岸四地文学研究】

海峡两岸当代少数民族文学问题的缘起 陆卓宁 /137

不同而和：比较视野下白先勇的文学观和创作理念

——与陈映真等比较 朱双一 /151

2 生命行旅与历史叙述

从小说到话剧

——谈白先勇《永远的尹雪艳》沪剧改编 陆士清 /172

台湾小剧场对西方前卫剧场的借鉴和转化

——以葛罗托斯基对台湾的影响为例 梁燕丽 /181

【东方主义批判】

西方视域下的“自我东方主义”书写

——以虹影小说为例 庄若江 余丽红 /194

从《金陵十三钗》看中国电影的“自我东方化” 周文萍 /203

【附录】

中国世界华文文学学会史料集萃 /211

编后记 /225

【理论前沿】

为了世界华文文学的新超越

——在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百年海外华文文学研究”研讨会上的主题发言

饶芃子

正值新学期开学之初，各个学校工作极其繁忙的时候，朋友们能抽出时间，应邀前来参加这个具有双重学术意义的研讨会，作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百年海外华文文学研究”的首席专家，我内心不无歉意，但更充满深深的谢意！

本重大项目于2011年10月25日正式获批立项，至今已整整两年。按项目要求，我们应于2016年10月结项，完成本项目的全部科研工作。两年来，各个子项目的负责人和成员都很努力，也在刊物上发表了一批具有相当质量的学术论文，但由于这是一个时间跨度长且属新兴学术领域的大课题，也是国家社科基金有史以来确立的第一个海外华文文学重大项目，课题本身极具创意，但难度大，因而我们必须去面对这一项目“破题”的许多困难。两年来，通过项目内部研讨和本人与子课题负责人之间多次的学术“对话”，各子课题已先后提出自己的研究提纲，在这一基础上，经几度沟通整合，现在已形成了本项目的总体性研究思路，也就是刚刚发给诸位的《百年海外华文文学研究纲目》（征求意见稿），希望通过大家讨论修正，最后定稿。

诚然，在过去的两年里，我们已有一定数量的阶段性成果，但整体上尚未进入核心部分的实质性研究。为了在未来三年的时间里，能够按时、保质地顺利结项，我们面临的研究任务还很繁重，作为本重大项目的首席专家，我在精神上有一种负重前进的紧迫感！为此，我特请大家来为这个总体研究纲目“把脉”，通过研讨，进一步修正补充，使其更为完善。与此同时，也就各子项目如何具体地落实和贯彻进行交流、对话、互动，突

破一些难点，解决若干疑点，明确研究工作的重点，特别是如何凸显其中的创新点，统一学术思路，使我们下阶段的工作做得更顺、更快，这是本次研讨会的内容，也是召开本次研讨会的目的。

这个会议为时不长，但内容之厚重不言而喻，它关系到我们今后三年的工作思路。未来三年如何做，做成什么样，能否确保在2016年如期完成这一重大项目，要靠大家的共同努力。本次会议，面对这么多年富力强的学者和年轻有为的新生力量，我充满信心。我虽年龄大，精力有限，但任务在身，作为项目的首席专家，我还是希望和大家一起做得更好一点。国家社科基金规划办对重大项目的管理向来十分严格，每年都定期检查项目的研究进度。两年来，我们的“年检”和中期检查都顺利通过，这也是大家一起努力的结果。

本次会议的召开，是为了进一步深化未来三年的工作，通过群策群力、互动讨论，达成一致的认识。王列耀教授要我在研讨会上作一个主题报告，阐释本次会议的主题。我想，这就是主题，是我们这么多人要共同去完成的一个大主题。下面，为了给大家的讨论提供一个“引子”，我把自己承担本重大项目过程中形成的几点新的认识，特别是对其所隐含的学术（学科）意义的认识，在这里和大家分享一下。

一、本项目成功申报的学术背景和学科意义

我认为我们这个重大项目的成功申报，是与三十年来这一新兴学术领域的发展和丰硕的学术成果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具有一种新的学术、学科背景。正如大家所知，海外华文文学这一领域发展的学术机遇，是伴随着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改革开放的春风而出现的，至今已有三十年的历史。三十年来，这一领域因其特定的时代氛围和资源土壤而得到了迅速的发展，成长为具有初步学科形态的一个领域。现在国内学界已经有了一支人数众多、老中青相结合的研究队伍，有数以百计的著作和难以计算的学术论文问世，先后在国内各省市举办过十七届全国性或国际性学术研讨会。随着这一领域学术脚步的前进，海外华文文学研究在国内外学界影响日大；现在国内已有多所大学开设这方面的课程，有的还成立了研究机构。海外华文文学研究已作为一个新兴学科进入国家教育体制。与此同

时，国家社科基金规划办也在科研体制内对这一领域有创新意义的项目给予关注和支持。这是本项目所处的新的学术背景，也是这一领域日益发展的新的学科背景。海外华文文学兴起之初，有不少人对其能否作为一个独立领域是持怀疑态度的。为什么？因为当时的学界还没有出现让人们相信它足以成为一个学术领域的成果。但是这些年经过几代人的努力，学界出了一批又一批的成果，使这个领域特殊的学术性和它的世界意义日益彰显。海外华文文学不但得到学界同人的认同，还作为一个新兴学术领域和有特色的学科进入国家各相关主管部门的视野。2002年，经国家民政局批准，“中国世界华文文学学会”在暨南大学成立。从“七五”以来，国家社科基金每年都有这一领域的科研项目立项。以我们暨南大学为例，“八五”至今就成功申报了多个项目，包括一般项目、青年项目、重点项目和重大项目。2007年，广东省教育厅还批准暨南大学“海外华文文学与华语传媒研究中心”为广东省普通高校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2009年，暨南大学成功申办教育部研究生教育创新计划项目——“海外华文文学与诗学”全国博士生学术论坛。2009年，我和杨匡汉教授主编，还有在座一些学者参与撰写的《海外华文文学教程》在暨南大学出版社出版；2011年，该书获得广东省优秀社会科学成果奖（著作类）二等奖；2012年，经教育部组织高级专家评审，该书被列入教育部“十二五”规划全国本科教材，向全国高校推行使用。《海外华文文学教程》的出版和推广使用，不仅仅是暨南大学和主编、撰稿人努力的一项成果，也是这一领域多年来老中青三代人共同“种”出来的一个“果实”。更重要的是，这一事实证明，海外华文文学已作为一个新兴学科得到教育部的支持。2011年，我们成功申报本重大项目——“百年海外华文文学研究”，这从国家社科基金立项的角度看，也同样具有标志性的意义。

上述的诸多事实说明，海外华文文学已经作为一个新兴学科进入国家的教育和科研体制。教育部正在聚集各方学术力量，将其建设成一个涵盖本科、硕士、博士的多层次、完整的学科教学系统。应该说，现在的学科形势对我们来说，是一种机遇。在这样的学术、学科前景下，大家应该受到鼓舞，更何况我们现在承担的正是这一领域确立的第一个重大项目，因此要倍加珍惜这种机缘，按既定计划，充分发挥每位项目成员的经验 and 智慧，同心合力，力争做出有突破性的学术成果。

二、本项目的学术内涵和特色

如上所说，我们的重大项目是在新的学术、学科背景下成功申报的，那么，在激烈的学术竞争中，我们的项目为何能得到专家们的认可？也就是说，国家社科基金规划办为什么会批准由我们课题组来承担这个重大项目？这直接关系到本项目所涉及的学术内涵和特色。下面，我从几个角度来谈谈这个问题。

第一，本项目研究的范围，既关注了百年海外华文文学的历史长度，又重视其地域的广度，时间和空间、长度和广度都兼顾。在学术内涵上，我们除了重视百年海外华文文学的历史梳理、地域文学状貌等内容外，还注重该领域所蕴含的诗学研究。我一直认为，诗学是文学研究的一个高度。我们在这个多元的学术框架中，要突出该领域文化上东西方多种的中外混融，除以往比较受关注的西方各国外，还有对东南亚、东北亚、大洋洲等地区的考察，从整体上展示其文学、文化形态多元重叠的复杂性；同时重视探索在这样一种特殊的文化生态下，其文学中诗学方面的“思、诗、史”的不同结构，形成一种具有超越性的学术成果。从中西方的文学传统看，西方的传统文学作品，是思与诗的交合多，而中国的传统文学作品，则是诗与史的交合多。海外华文文学是多种中外文化混融以后的一个具有世界性的文学领域，这当中所蕴含的诗学结构应该是多种多样的。这种“思、诗、史”在不同地域、国家形成的不同结构，同中有异，异中有同，我们要从诗学层面去探讨和阐释，不能只停留在文学文本的基础解读层面，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如做得好，也是本项目最具特色的亮点。总之，我们这个项目，既要去面对海外华文文学百年的长度、空间的广度，还要展现各种标志性文本中所蕴含的诗学高度。具体而言，就是要有我们自己的发现和特色。

第二，自觉的学科史意识。在“史”方面，我们既关注和研究世界华文文学的发生史和发展史，也重视这一领域的学术史、学科史。发生史要从这一领域的源头梳理起，学科史是新近才受关注的事情，我们要做到远近交接。现在的第一个子课题，发生史、发展史的脉络比较清晰，学术史、学科史方面的设计思路还可以细化。我建议该子项目的执笔者可参考

一下《海外华文文学教程》“导论”，因为当中有我关于这个过程线索的梳理。记得最早提出要有学科意识的是刘登翰教授（于1993年在暨南大学召开的“华文文学机构负责人联席会议”上提出来），他认为“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不同于中国大陆本土的文学，如参与的人多，学术上做得好，说不定以后可以建成一个学科，所以我们应该有学科的意识。后来，我也主张要有自觉的学科意识，并且努力做一些有关学科理路的爬梳和学科理论建构的工作，但我正式倡导要把这个领域建成一个学科，是在1995年。现在，多少年过去了，经过几代人的共同努力，如上所说，这个领域已建成一个学科，并且成为国家教育体制内的一个新领域。梳理这一领域的学科史，可先将一些重要的标志性事件按编年史的方法排列出来，从中整理出一条学术上的演进思路，然后再作横向的扩展研究，体现出一种“史识”。我大学毕业后曾留在中山大学中国古典文学教研室当助教，我的导师王起（王季思）先生曾多次教导我：做学问一定要重视史料，也就是论据，不能只停留在大概的印象上面。现在我们研究这一领域的学术史、学科史，只有以资料为基础，朝精细方面做，才会有大的突破。

第三，重视比较文学的视野。我曾参与各种项目的评审工作，发现那些做得好的论证都不只是垂直看问题，而且视野往往比较宽广。我们这个领域的文学自身就有许多“跨越”，完全可以做到学科融通，如引入比较文学的视野和方法，通过跨文化、跨地域、跨国别、跨语言等，从不同角度“互看”，从中生发出新的、有创意的思路 and 观点，特别是中国文学在国外“旅行”、与国际“对话”之后，针对文化、文学、美学、艺术各方面的变化、转型、创新和发展，以及其作为一个特殊的文学领域在文化上多元重叠的世界性意义，作更深层次的展示和阐释。比较文学研究的是世界各个国家、民族的文化与文学的比较，很符合我们这个领域的学科特点。

上面所说的是我对本项目几点特色的认识，概括起来就是：重视其在长度、广度和诗学上的特色，再就是世界视野和比较方法。以上这些，不一定说得准确，仅供大家讨论时参考。

三、五个子课题的内在联系

下面，我借此机会，把申报时所设置的五个子课题，以及它们彼此的内在联系作进一步的说明。这五个子课题最早是我提出来的。为什么这样设置？它们之间有什么内在联系？这五个子课题在重大项目中各有自己的位置和作用：第一个子课题“海外华文文学学术史研究”，是“纵”；第二个子课题“海外华文文学的区域发展研究”，是“横”；第三个子课题“海外华文文学的经典解读”，是“点”；第四个子课题“海外华文文学的跨界研究”，是“跨”；第五个子课题“海外华文文学的理论批评研究”，是“论”。如果说，第一个子课题是通过“纵”梳理“明史实”；第二个子课题是通过区域研究“识广度”；第三个子课题是通过经典解读“立标志”；那么，第四个子课题是通过“跨界”研究“探影响”，也就是寻找其对相关领域、学科所产生的影响；第五个子课题理论研究是要“立高度”，即诗学的高度。所以，这五个子课题是交合的，“纵”、“横”、“点”、“跨”、“论”，彼此之间有不可分割的逻辑关系。要完成百年这么长的海外华文文学研究，这五个子课题必须相互观照，不能割裂。为此，我们课题组的成员，在各自的研究中，一定要注意各子课题间的内在联系，不能各行其是。

四、我的学术期待

现在，我们群策群力，用五年的时间来做这么一个重大项目，我想，大家心里都会对此有所期待。作为本项目的首席专家，我所期待的是努力做到下列几个方面的突破：

第一，寻找百年海外华文文学的世界坐标。记得2012年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的指南中，有一个题目是“20世纪世界文学史的新建构”，就是引导学界去关注和研究如何重新建构20世纪世界文学史的问题。因为一百多年来，世界的文学地图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原来编写的世界文学史已与现实不尽相符，所以必须重新建构20世纪的世界文学史。那么现有的世界文学史存在哪些问题？这需要有关专家认真研究，才能得出全面、科

学的结论，但其中比较突出的一点是文化上的“西方中心论”明显。学者们普遍认为要改变这一现状，在文化上应做到从“一元”到“多元”。我们这个重大项目的研究对象虽然是海外华文文学，但同样要求研究者要有世界视野，要去关注该领域中外混融，多元文化相遇、交汇和重叠的诸种现象，实际上这已经突破了过去民族文化和国别文学的范畴，是对20世纪世界文学中一个新兴文学板块的研究。这个项目如能做得好，就可以为人们即将重新建构的、以多元文化为基础的20世纪世界文学史提供某种事实依据，拓展一个新的领域，增加一种新的文学元素，其在这方面的学术意义是我们不能忽略，也不可忽略的。

第二，希望通过这个项目的实施，在国内学界形成一支跨省、跨校、老中青结合的学术团队。当然，这一团队的骨干是中青年学者。通过几代人的积累和努力，以及各方学术力量的互动，为教育部门建立多层次、完整的海外华文文学教学体系，提供一支有学识、有能力的教学、科研队伍，作出我们的贡献。总之，要通过做这个项目开展更多的交流互动，力争在全国学界不断产生新的互动成果。

第三，希望我们这个团队在完成重大项目之后，能够把现在第四个项目所涉及的相关领域都作为我们的研究对象。也就是说，今后我们的研究，不仅要着眼于文学，还要对海外华文文学多种“跨界”的现象进行考察，在“互看”中挖掘出新的学术生长点，发掘这一领域更多、更广的文学、文化意义，拓展这一领域的跨学科研究。

以上这些，就是我所期待的，至于能否做得到，要看我们主观的努力和客观的条件，借此机会，提出来跟大家交流，如有不当之处，请大家批评指正。

（2013年9月14日，龙扬志根据录音记录整理，经饶芃子修订校正）

作者简介：饶芃子，暨南大学中文系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文艺学、比较文学和海外华文文学。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百年海外华文文学研究”（批准号：11&ZD111）。

论威权统治和主流立场对台湾文学的影响^①

张诵圣著 刘俊译

【摘要】20世纪50年代以后的台湾文学，伴随着国民党当局对台湾文学控制力度和控制方式的变化，在文学追求和文学形态上，也呈现出一些独特的特点，如从对文化控制的顺从到对相对自足的“纯文学”美学的追求。在这个过程中，文化控制和文学自立、主流立场和美学坚持之间的复杂关系，就构成了影响台湾文学风貌的重要因素。

【关键词】台湾文学；软威权统治；主流立场；“纯文学”美学

20世纪90年代台湾当代有代表性的新闻报道，在记录国民党党外势力的形成和本土文化的觉醒——从中国当局中心论的历史叙述中觉醒——方面，尤其着力。20世纪70年代的乡土文学运动，不无争议地标志着这一过程的开始，根据乡土作家王拓的短篇小说《金水婶》改编的电影中有一个镜头有助于说明这一点。运用一部文学作品去证明民众反抗专制政治统治的存在当然极其普通，但在这种单向度的表现中，焦虑和不确定性都被忽略了。当官方认可的、居支配地位的文化话语遭到挑战并被宣布非法的时候，许多作家、政治家和普通民众都必须经历艰苦的再学习和再适应的过程。1970年到1990年发生的自中国中心到本土文化框架的转变——两者都源于并受到执政当局威权统治崩解的影响——恰好是在台湾重新确立支配文化的过程当中，使这一过程立刻变得自由又令人紧张，也在文化领域产生了巨大的能量和动力。

与此密切相关的一个问题是，居支配地位的、注重文本的文学研究忽视了在威权统治社会中、文学场域里占据主流位置的作家的作品：专制统治者的权力严重地依赖有效的文化控制，而现代化的要求决定了文化领域

^① 本文译自 Sung-Sheng Yvonne Chang, *Literary Culture in Taiwan: Martial Law to Market Law*,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4, 题目为译者所加。

既要适应知识分子阶层表达自由的需求，也要适应广大读者的趣味。因此，文化控制系统就充满了暂时性的计划、权宜性的战略和大量强制性的指示。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明确地昭示了主流文学位置自相矛盾的本性。

一、“积极的”文化控制和外省人主导的文化生产

埃德温·温克勒在他 1992 年的一篇文章《战后台湾的文化政策》中，创造了一个术语来形容台湾国民党当局强制推行的文化政策：“在所有文类中，国民党当局的基本路线是要遵循‘三民主义现实主义’——不仅仅是防止异端言论，而且要促进那些强调台湾发展、兴旺、发达的正统思想”，此外，不断试图“提供健康的休闲活动以取代那些他们认为不健康的休闲活动”，这种乐观的、向前看的精神构成了台湾当代主导文化的一个重要方面，而它对整个社会心理所产生的广泛影响正对应了雷蒙德·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对“霸权”的描述：

霸权在这里不仅是明确的上层“意识形态”，它的控制形式也不只是通常被认为的那样是“操控”或“灌输”，它是超越整个生活——我们的理性和对精力的安排、我们对于我们自己和我们的世界的形态感知——的实践和期待的整体。

国民党当局建立的主导文化，其持续的意识形态影响的一个很好的例证是 1994 年的台北市长选举中参与竞争的台湾新党——主要由因反对李登辉的“台湾化”路线而从国民党中分离出来的外省第二代政治家组成——在群众集会的时候，极力要恢复它健康、稳健的“中产阶级”形象。一个极具宣传性的要求是，新党的支持者在每一次竞选集会之后都要有礼貌地清扫干净场地，并且他们中的任何一个人在游行的时候都不能穿便鞋和嚼槟榔——这一要求让人联想到国民党在 20 世纪 30 年代发起的“新生活运动”。新党这种具有现代礼仪的形象，帮助它赢得了城市中产阶级的选票，并使它与民进党的支持者（草根的下层阶级）区别开来；民众从戒严时期保守的主导文化中内化了的价值观，因此能够继续在后来的政治斗争中发

挥重要的作用。

然而，积极向上的谆谆教诲、道德主义的价值观如果缺乏一种有效的、包括一个强制执行的代理机构的控制系统，它就难以实现。戒严时期，国民党政权既运用生硬的强制手段，也运用更为精妙的技巧来锻造它的文化霸权，不过主要是后者对社会产生了持续的影响。台湾的控制体系主要依靠温克勒所说的“建立任人唯亲制度”。他的这一判断包括台湾戒严时期决定文学生产的其他一些因素：

台湾“战后”绝大部分时期最坏的三个方面是政府、市场和关系网——政治上的审查制度、经济上的唯利是图和关系网中的任人唯亲。当局的强硬干预、金钱上的严格控制……个人关系网的无处不在，更不用说他们对监控和遥控的使用，使客观的评论和不带偏见的论述非常困难。

温克勒触及了1949年以后台湾一个极其重要的文化控制手法，即在每一个层级的文化机构和教育系统安插政治上可靠的代理人，这一行为涉及了“族群”或“省籍”这个困扰国民党当局在台湾几十年统治的核心问题。

在1949年刚刚过去的那些年里，外省流亡者是执政者可靠的同盟者，通过他们，台湾当局能够有效地将关于媒体陈述、学校课程、所有文化活动和话语的指导方针强加给他们并建立起参数系统。在文学生产领域，绝大多数出版商、报纸副刊和文学杂志的编辑以及文化官僚都是外省人，激进的语言政策——宣布汉语是官方语言并禁止使用日语——实质上是将大多数在殖民时期受日本教育的成名作家排除在外，令竞争对外省人来说变得较为容易，这意味着在1949年后最初的岁月里，政治力量在划定文学领域、使外省人相对于本省人而言占有绝对优势方面，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虽然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由外省人主导的文学场域受到了一种政治的高压支配，不过幸运的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国民党的文化政策逐渐从“强制”向“霸权”转变，从严格的审查制度和经常地对文化参与者进行钳制向具有广泛基础的自发支持者的圆熟操纵转变，由是，一种可行的、新的、具有鲜明特征的主导文化终于形成了。它是最早的也是最重要